

[第四辑]

社会理论论丛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周晓虹 成伯清 主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源刊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社会理论论丛

[第四辑]

周晓虹 成伯清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理论论丛(第四辑)/周晓虹,成伯清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301-15266-9

I. 社… II. ①周… ②成… III. 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1134号

书 名: 社会理论论丛(第四辑)

著作责任者: 周晓虹 成伯清 主编

责任编辑: 郑 震 周丽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266-9/C·052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 11.75印张 308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社会理论论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杜维明 金耀基 郑杭生 苏国勋 叶启政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成伯清 方文 冯钢 侯钧生 李康
刘少杰 渠敬东 沈原 王宁 王小章
文军 肖璞 谢立中 许钧 翟学伟
张凤阳 张一兵 周宪 周怡 周晓虹

主编

周晓虹 成伯清

编辑部主任

汪和建

编辑部成员

谢燕清 杨渝东 郑震

编辑部地址

中国南京市汉口路22号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理论论丛》编辑部

邮编: 210093

电话/传真: 86-25-83593524

电子信箱: stheory@nju.edu.cn

卷 首 语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一词取代了“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或者“有关社会的理论”(theories of society),渐成为世界学术圈中主流性的话语形式。这一转换,大致有着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基本上源于欧洲的现代社会思想,经过偏好操作化和专业化的美国学术体制的改造以后,成为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复又挟着美国现实政治之力量,几乎散布全球。而这种美国式的社会科学实践及其结果,难免导致标准化而又琐屑化的枯燥数字,在复杂多样的现实面前,解释起来往往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欧陆诸国的学者,在抵制学术美国化的同时,也逐渐重整旗鼓,夺回了社会理论创新的重镇地位。在克服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僵化的分工上,社会理论的提法无疑可以获得更为普遍的认可。真正的学科交叉,多种方法的兼容并蓄,也只有在社会理论的旗下才能实现。

其次,正统的社会学理论力图同哲学划清界限,而其之所以能够如此主张,无疑是奉实证主义为圭臬。实证主义之局限性,如今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社会学理论历来强调自己的经验性,但对于日益流变不居的现实,拘囿于经验的知识,实难充当人类行动的认知标示(cognitive mapping)。再说,哲学本来就不可避免地缠绕在社会科学的上下。下者,为之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者,则为之超越直接的客观知识而描绘出一幅相对完整的社会世界图景。倡导社会理论者,多是有意识地利用哲学思维来反思经验研究的局限,弥补经验陈述力所不逮之处。不过,社会理论绝不是要回到社会哲学的立场。统而言之,社会

理论既是经验取向,又含推论臆测成分,以能提供富有想象力和洞察力的视角为宗旨。

再次,社会理论的主张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探索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人类发展至今,已经前所未有地成功克服了外在的限制;未来的一切,端赖乎人类自身的选择。社会生活的变化演进,不复被认为是某种本质的展开,或者是永恒规律的实现。在攸关人类前途甚至命运的问题上,社会理论可以呈递较为全面的参照框架,至少在参与话语竞争时,凸显一种社会思维(social thinking)。

另外,在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的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容器颇含实体意味的“社会”(society),不再是唯一的参照框架。学者们毋宁以更为笼统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来概括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在目前的形势下,一如国际格局的多元化,社会理论领域中也是歧义迭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理论也要比从研究西方现代性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学理论,更能涵盖发展的多样性形态。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准备以文集的形式,为社会理论提供一块有限的阵地,让同好者有表演的机会。对话和沟通是我们现实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我们希望在这块社会理论的园地中,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国籍的人,只要有讨论社会理论的兴趣,均可获得公平的对待。当然,既然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情,也得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对于每份来稿,在经过编委会的初步审核后,适当者都要经过两位匿名阅稿人的评价,以确定刊登与否以及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本论丛每辑篇幅在25万字左右,初步设立以下篇目:

(1) 专题研讨:主要就某个重大而有理论意义的话题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讨,既围绕一个核心,又集多家之言。

(2) 学术论文:主题不限,无法纳入专题者即归其类,但学术标准一样。

(3) 海外文稿:在约请海外大家的专稿的同时,也接受其他

海外社会理论研究者的文章,以期了解国际学界的中心兴趣和发展趋势。

(4) 学术随笔:包括与社会理论有关的学术造访、人生见闻、人物札记和感悟等等,力求文字活泼,可读性强。

(5) 批评与回应:本篇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为书评,目的在于向学界推介近期出版的优秀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其二为对本论丛发表的文章的学术批评及作者对批评的回应,旨在加强学界的理论互动,为建立健全的学术评价体制尽绵薄之力。

我们希望《社会理论论丛》的出版,能够获得学界的呼应和支持,并由此推进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知识的增进。

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评定并报教育部批准,自2008年起,《社会理论论丛》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集刊。

《社会理论论丛》编辑部

目 录

专题研讨:社会认同

作为风险的认同与作为认同的风险

——认同视角下的风险社会生产机制研究

..... 肖 瑛 (1)

民族主义与族群 克雷格·卡尔霍恩 (47)

民族认同:族群、地方与其他 褚建芳 (88)

中国人的关系认同取向:以人际称谓偏好为例

..... 陈午晴 (121)

当代中国乡村宗族认同的表达方式及其脉络 ... 吴作富 (147)

学术论文

全球化趋势下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戏目 叶启政 (158)

从“自由或共同体”到“自由的共同体”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和重构 王小章 (186)

社会的重建:在个体化社会中拯救

被围困的社会 郑 莉 (222)

现代生活的诊断与审美救赎

——齐美尔的现代性批判路径 ... 杨向荣 何承超 (240)

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批判三题

——基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 胡翼青 (257)

海外来稿

- 把理论带回来 罗德尼·斯达克(273)
公民社会、社会资本和经济发展 戴维·斯基德莫尔(296)

学术随笔

- 帕斯卡尔的实践哲学 郑 震(325)

批评与回应

- 和辻哲郎的地缘哲学和文化多元性 李晟台(340)
等待道德救赎的旁观者
——鲍曼后现代大众传播思想述评
..... 周培勤(350)

专题研讨:社会认同

作为风险的认同与作为认同的风险

——认同视角下的风险社会生产机制研究

肖 瑛*

1984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硕特(Short, J. F.)在美国社会学学会年会发表就职致辞中呼吁风险(risk)研究和风险分析实践的社会转向,号召社会学家更多地参与到发生在该领域的各种学术取向和政策取向的对话中去。硕特认为,在对与风险相关的现象的研究上发展出一种社会学视角,不仅会促进风险研究,而且能够把社会学置于各种重大的社会讨论和争论的中心位置,并对这些讨论和争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Tierney, 1999)。硕特的演讲是1982年美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 M.)与维达夫斯基(Wildavsky, A.)共同出版《风险与文化:技术与环境危险文选》以来号召社会学关注风险现象的第二个强音。1986年德国社会理论家贝克出版了著名的《风险社会:通向一种新的现代性》;该书1992年翻译成英文出版,同吉登斯在1990年和1991年分别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和《现代

* 肖瑛,博士,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本研究获得上海高校社会学研究院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7BSH003)资助,特致谢忱。

性与自我认同》合流,奏出了风险的社会学研究的第三个高音。至此,“风险”开始成为全球社会理论界和社会学界的一个主流论域,成为一般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Shaw,2001),并随着切尔诺贝利事件、温室效应、转基因作物、疯牛病以及“9·11”的发生而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罗大众的目光。在很大程度上,科技风险甚至已经成为与经济增长困境并置的影响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现代化早期,经济风险的化解和经济成就的最大化是一种政治制度维系其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但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因素在合法化层面的地位依然存留,但技术风险对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关注(Alario & Freudenburg,2003)。有鉴于此,有学者指出,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向,从基于启蒙运动的信念急剧转变到以风险理念为基础,风险社会和风险社会理论构成当前社会和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Clarke,2006)。

一、风险:社会学化的路径和认同的提出

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在模塑自然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预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定量研究迄今为止依然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的主流学术取向。但是,颇为悖谬的是,在社会学界,风险研究走的却是反定量方法的道路,通过挑战风险计算等传统研究路向得以成型。在迄今发表的各种风险社会学研究成果中,社会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得相对较少,大多数文献都强调风险的社会建构,强调风险的难以客观化和量化,以质性方法见长。这就产生两个问题:社会学介入之前的风险研究是怎样的?社会学是如何使风险研究社会学化的?

“风险”(risk)是一个现代性的反思性概念。相对于各种自然灾害和传统社会中人们日复一日的例行性活动所带来的各种后果而言,“风险”是在旨在克服这些听命天的调遣而无法预测

的灾难的理性行动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人理性地改造世界的必然后果。从这个角度说,“风险”是现代的。但是,早期的启蒙理念并没有对“风险”同人的行动的相伴相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相反,启蒙理性主义坚信人类能够“消除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能够“使模棱两可的事物变得一清二白,使不透明的事物变得透明,使不能预测的事物变得可以预测,使不确定的事物变得可以确定”(鲍曼,2005:6—7)。但是,理性的实践史无情地否弃了启蒙理性主义的这种自我想象。为此,理性主义者不得不在以后的实践中放弃对“确定性”(certainties)的无条件追求,而将之改为“可能性/概率”(probabilities)。道格拉斯说,过往的风险研究把“风险”视为关于将“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转化为“可能性/概率”的努力,使不确定性建立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之上,切断其同道德和政治等因素的联系,从而使超越个人性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接近它们,控制它们(转引自 Hollway & Jefferson,1997)。“可能性/概率”的提出,一方面是启蒙理性主义对“确定性”这一自我预设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为“风险”的出场洞开了逻辑上的大门,因为“风险”是“可能性/概率”的题中应有之义,意味着任何理性行动都不可能是完满的,都必然带来某些缺漏和负面的或者意外的后果。从这个角度看,“风险”显然是现代性自我反思的结果。

另外,“可能性/概率”的提出为确立科学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建立一门风险科学创造了必要前提。“可能性/概率”意味着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风险”既是人之理性行动的必然后果,又始终处在人之理性能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非社会科学的评估始终如一地把“风险”描述为物理世界或者技术世界的特点及其组成部分;事故或者灾难的发生是因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没有如预计的那样发挥作用。当灾难确实发生时,非社会科学探究灾难原因的范围也不宽泛,主要强调的是离灾难最近的各种条件,一般而言只涉及两个因素:物理/技术系统的失败和“人为错误”(Tierney,1999)。这种

个人主义风险评估理论(individualised risk assessment theory),不仅构成了保险业的理论基础,而且因为其强调可以对各种风险肇因进行预测和控制,只要责任部门按照这门科学的要求做了充分的准备,即使风险发生也无需担负责任,故“成了逃避和分配谴责的管理装置”(Denney,2005:14—21)。

同把风险视为客观的、可知的、可量化的、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等待人们去感知和界定的现象的实在论相反,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风险和风险评价都是社会建构的。风险的社会建构论可以分为强建构论和弱建构论两种路径:强建构论认为这个世界上压根不存在风险,风险的出现端赖于人们的认知、感知和阐释;弱建构论不否定风险的存在,而是试图弥合科学知识同公众测量风险和作出决定的方式之间的鸿沟,其基本任务是解释社会能动者怎样创造和利用各种边界来区分哪些现象是风险,哪些不是风险(Pidgeon & Kasperson & Slovic,2003:1;Tierney,1999;Lupton,1999;Denney,2005)。一般地看,风险的社会建构论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涉及影响风险对象的选择的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譬如各种社会行动者,包括突生群体、社会运动、企业、政府代理人和专业人士怎样形塑风险的各种特征、如何选择风险管理策略,以及其与组织之间围绕利益、权力和资源合法化而产生的深刻关系。第二个主题聚焦于对正式风险分析的社会建构上。这个主题深受科学社会学,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法等国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影响。从SSK的基本预设出发对风险研究的科学路径进行追问和批判,揭示各种社会过程和制度影响甚至支配这些罩着科学光环的风险评价活动的具体方式和机制,从而破除了科学是客观的、普世的,具有发现科学真理的能力,是风险评价的真正基础的“迷信”,使得在风险感知和评价方面,科学沦落到同常识一般的地位(Tierney,1999)。这种研究路径具有“元—风险科学”的特征。

“风险是社会性地建构的”在风险研究中的地位的确立,当然要引入“认同”(identity)这一观念。近数十年来,从政治合法

性的求取到个人本体性安全的获得,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到对人之生命的无意义感的叹息,“认同”是一个出境率相当高的概念。“认同”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学术的后现代转向特别是社会建构论转向有着密切关联。在这个转向中,一些平素不为人所注意、高度文学化的概念——如“修辞”(rhetoric)、“诠释”(interpret)、“建构”(construction)、“想象”(imagination)、“符号/象征”(symbol)——凸显出来,并很快进入社会学和政治学视野,催生出的成果之一就是建构主义角度对“社会何以可能”的回答,包括对“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重视。正如很多的后现代主义学者所宣称的那样,“修辞(rhetoric)^①并不是罩在真实的深层结构外面的一层外罩,并不是‘简单的隐喻’。它实实在在就是那真实存在本身”(伯克维奇,2006:12)。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认同”同样是一股非常强大甚至神奇的力量,它虽然是想象的,却可以建构出实在来,不同的认同生产出不同的社会(卡斯特,2003a:ch.1)、不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安德森,2005;亨廷顿,2005)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冲突的重要根源(亨廷顿,2002),并构成个人本体性安全的基础(Giddens,1991)。

在英语中,“认同”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使自己与某一个人或者群体密切联系或者依附于他们”,建立同他人或者群体的一致性。从这样一个简单界定中,我们可以引申出关于“认同”的多个维度的理解:第一,“认同”是一个社会学——或者至少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而“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或者“在与某些人的对话关系中,我才是自我”(泰勒,2001:48、50)。任何认同,包括自我认同,从参照系选择上看都是社会认同,都是以特定社会中的人或者社会群体为参照而展开的,是对自己“归属于何种社会范畴或者组织”(Stets & Burke,1998)的思考。第二,认同强调的是

① 原文翻译为“言说”;遵照惯例,笔者在引用时将之改为“修辞”。

个人或者群体的自我建构,即强调认同承载者的主体性。泰勒(2001:48)指出,“自我部分地是由其自我解释构成的”。卡斯特(2003a:2—3)则说,“关于认同,当它指涉的是社会行动者之时,我认为它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角色是由社会的组织与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认同则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无独有偶,亨廷顿(2005:20—21)也说,“identity 的意识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 都是构建^①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 identity。”由此不难看出,“认同”的形塑不同于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或者角色安排;个人或者群体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和建构权力,能够对各种外在因素作出适当的“诠释”(interpret),作出接受即内化或拒绝的选择,是行动者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能力和行动的反身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能力提升的结果和表征(Giddens,1991)。当然,认同不是单向的,而是主体间性^②的,在交流过程中得以实现。这也许是泰勒(2001)把语言引入对认同的解释中的根本原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强调认同者的能动性并不等于说人们在“认同”的选择和建构方面是完全自主的,完全听凭自己的理性的支配。事实上,由于认同的力量很快被强势群体所认知,“认同”就不可规避地成为各种力量角力的领域。“认同”的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往往是隐性的,并且受着特定的基础秩序的约束,受着各种力量的影响甚至支配,是一个理性与感性、个人理性与群体意识形态、个人诉求与结构性力量相互争斗

① 疑为“建构”(construct)。因找不到原文,无法确认。

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使用的“主体间性”并不是下文中所使用的“主体间性”所隐喻的两个完全平等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虽然互动双方均处在“主体”地位,但他们的地位并不完全一致,这需要根据具体语境进行分析。

的过程,在个人身上常常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样子。第三,“认同”的寻求与行动者诠释、建构自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归属是同一个过程,从心理和精神层面体现和强化着人的社会性。认同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和基本偏好(Benjamin & Choi & Strickland,2006)。“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泰勒,2001:38)。在吉登斯(Giddens,1991)看来,这种道德感本质上是人的意义感的依据和基础,“生存的孤立”或者说“个人的无意义”,并不是指人和人之间的分离,而是指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源泉的分离,指现代人的纯粹工具主义行动取向。认同的获得,填补了工具主义造成的意义和道德空缺。第四,认同对意义的追寻与对秩序的追寻纠缠在一起,不仅追求社会的秩序,也追求个人心灵的秩序,追求心灵的安顿和安全。鲍曼(2002:126—127)关于“认同”的分析足以佐证这一点:“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提到认同^①,在我们理念的背后都有一个和谐性、条理性 and 一致性的模糊的镜像:所有的那些东西在我们体验之流中看起来——让我们永久绝望地——都是严重地非常缺乏。对身份的追寻,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的斗争。”第五,信任构成认同的基础。埃里克森的心理研究表明,处于婴儿期的孩童在与看护人的互动中培育出一种“基本信任”,这是抵制成年以后各种焦虑的有效武器。信任不仅意味着与看护人以及他人保持协调关系,也是相信自我的基础,“对他者的信任是与内在的可信任性的形成同时得以培育的,后者为后来稳定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Giddens,1990:94)。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认同”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信仰”(belief),最低标准是“认可”(ac-

① 原译文为“身份”。

cept),核心机制是“信任”(trust)。第六,认同建立在区分“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这样一种社会分类的基础上。“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渴望独特性和渴望归属感这两种相反动机的同时推动下进行的,因此,在寻求对立面的过程中确立认同是其基本的手段,“认同不仅是通过人们同其他群体有什么样的关系,而且是通过同其他群体进行比较而建构的”(Padilla & Perez,2003)。而且,“‘组织内’认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它所宣称的高于‘外群体’,以此否弃后者的意义”(Goldstein & Rayner,1994)。为建构对某一群体的心理和精神归属,认同主体或者该群体的支配者甚至不惜运用“偏见”(bias)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Brown,2000),突出“内群体”对于“外群体”的无以超越的优越性(Padilla & Perez,2003),带有强烈的我族中心主义色彩。有鉴于此,亨廷顿(2005)明确宣称,为了建立关于“我们”的“认同”,必须寻找对立面,即建构“敌人”,从对“敌人”的想象中寻求我们自身的形象。在赛义德看来,这种通过同消极性群体的比较来获得积极认同的方式无论在初民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一致的(转引自Joffe,1999:18—19)。

由此不难看出,“认同”是一把双刃剑。“认同”的发现标志着人类生活新增了一个困境:“认同”带来的不仅是人的意义归属的获得,而且还有它同利益、权力纠缠在一起后所释放的“文明冲突”的力量;不仅是“内群体”所内在的共同体感和团结感的迸发,而且还有整个人类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认同的这样一种悖论性力量结构在今天信息社会、风险社会和全球社会交错形成的背景下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呈激进化态势:一方面,如鲍曼所言,“流动的现性”构成当今社会的基本特点,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和相对化从根本上抽空了认同必须依赖的确定的参照群体,“怎样认同”被置换为“认同何以可能”;另一方面,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普遍充斥着组织崩溃、制度丧失合法性、主要的社会动员消失无踪,以及文化表现朝生暮死的历史时期里,认同变成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来